

邹进诗集

它的翅膀 硕大无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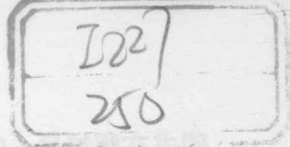
一边是白昼
一边是黑夜

邹进◎ 著



Large and invisible its two wings are
one for day, one for night

古吴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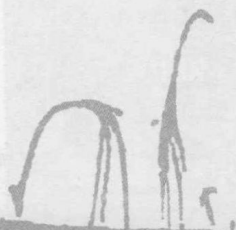
中国图书馆藏

邹进诗集

它的翅膀 硕大无形

一边是白昼
一边是黑夜

邹进◎ 著



中医学院 0658804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邹进诗集：它的翅膀硕大无形，一边是白昼，一边是黑夜 / 邹进著. --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1.6

ISBN 978-7-80733-642-6

I. ①邹… II. ①邹…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5577号

责任编辑：李 蓓

特约编辑：方模启

封面设计：零三二五艺术设计

书 名：邹进诗集：它的翅膀硕大无形，一边是白昼，一边是黑夜

著 者：邹 进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6.5

印 次：2011年6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642-6

定 价：27.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010-63706888

目录

Contents

邹进大学时代就写诗，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是有影响的诗人。走出校门后虽然生活不断发生着变化，但他一直坚守着诗，也可以说坚守纯正的人生境域。

——牛 汉《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纪念》

“作为序的一组回忆录” 001

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纪念 003

牛 汉

不能叫做序的自序 005

邹 进

《中国》人的一个梦 012

冯夏熊

和邹进在《中国》的日子 023

王中忱

往事无湮 030

林 千

1982年，大学刚毕业 051

吴 滨

《中国》文学月刊往事点滴 054

鲍学超

“诗歌集”

061

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纪念

牛汉

作为序的一组回忆录

这是一篇我多次要写的序。要写很简单，为了写，更为了我们那一代难忘的人生经历和修正的反思。

我一生编过三个刊物，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五十年代的《新文学史料》，八十年代中的《中国》。

这三个刊物，《中国》只出了一期，被查封，《新文学史料》出了两年，就停刊了，也许这就是命运。但我为此两

册做，特别是《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她的价值。我是《中国》的伙伴，有力的助手，希望明，来

我再来，《中国》终于号就交给于承前在西安印。那是一系列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一个事件改变了

老朋友的命运，其中也都知道，那时我就感到那

痛苦，果然没有看见。走上大学时代就写诗，在当时的大学中

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纪念

牛 汉

这是一篇我必须要写的序。理由很简单，为了邹进的诗，更为了我们那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和纯正的友情。

我一生编过三个刊物：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流火》，七十年代末的《新文学史料》，八十年代中的《中国》。这三个刊物，《流火》只出了一期，被查禁；《中国》出了两年，就停刊了。也许这就是命运。但我为这两个刊物骄傲，特别是《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她的价值。邹进是我编《中国》的伙伴，得力的助手。他聪明、实干，又勇往直前，《中国》终刊号就是经他手亲自在西安印发的。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一“事件”改变了编辑部很多朋友的命运，其中包括邹进。那时我就感知邹进是一个强者，果然没有看错。

邹进大学时代就写诗，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是有影响的诗人。走出校门后虽然生活不断发生着变化，但他一直坚守着诗，也可以说坚守纯正的人生境域。如果邹进早些年编这本诗集，我一定会认认真真地谈谈他的诗。可现在我

已年近九十，几年未动笔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写这篇小序，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纪念。

它的翅膀硕大无形
一边是白昼
一边是黑夜

不能叫做序的自序

邹进

这个集子里的诗除了第一首，全都是2009年写的，集中了两段时间，三到五月写了一部分，八到十月写了后一部分，强迫自己写，当做日记写，差不多能出一个集子了，就不写了。所以，创作不是什么有感而发，而是实实在在的劳动，没感也可以发。

第一本诗集我请了我们“赤子心诗社”的同学写了一组序，取名叫“作为序的一组散文”，我跟他们说，不需要评论我的作品，那还要挤出一大堆好话来，听了也未必受用，就写写大学生活，我们的交往，当做是一次聚会。出版后反响不错，有的说序比诗好看。这是自然的，写诗的人没有少，但读诗的人确实少了。这回我请了《中国》编辑部曾经的同事为我写序，取名就叫“作为序的一组回忆录”，回忆我们1986年那段激情的岁月。

从《赤子心》到《中国》，是我走过的近十年的文学路程。《赤子心》是我大学时代的学生诗刊，自己写自己编，油印出来再跟别的学校的社团交流，相当于发行了。

那时就梦想会不会有一本刊物让自己编，在大学就有了这个情结，后来还真的当上了文学杂志的编辑。

1985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教研室有一同事叫孙瑞珍，做现代文学研究的，跟一些当时还在世的老作家有联系。有一天她对我说，丁玲创办了一本叫《中国》的期刊，想要一些年轻编辑，问我想不想去。我当然是太想去了，可是不好意思向系主任开口。我从保险公司调入语言学院刚一年，说好至少三年不提调动的。那时认识吴滨，他在《中国金融》杂志。一天下班又到我家来，跟他说起《中国》的事，他一下就兴奋起来，一定要让我带他去见孙瑞珍。好像我们当时骑了车就去了，从宣武门骑到五道口。吴滨就这么进了《中国》。

我进《中国》又是吴滨介绍的。他去了《中国》后还经常到我家来，把《中国》的情况也带来了。有几点特别吸引我，一是说那里的人是多么好，说牛汉放手让下面编辑编稿，不加干涉。还到过丁玲家，说老太太特别喜欢年轻人，根本不像我们印象中的“左派”，在编刊物上恰恰还是个“右派”，什么激进的想法都能接受。说话语气，就感觉老太太听他的一样。还有一点吸引我，老太太主张编辑可以在自己刊物上发自己的作品。说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刊物，哪个编辑自己不是作家，自己不会写，有什么资格编别人的稿子。我本来就不喜欢投稿的，对非著名的诗人们，那是很折磨人的一件事。能在《中国》上发自己的稿子，那不是太好的事了吗。再叫吴滨一鼓动，就下决心非走不行了。后来调

动也费了一些周折，好像王中忱还让老太太给我们院长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想调我到中国作家协会，请语言学院大力支持云云，这样我就到了《中国》。

《中国》是一个有明确主张的刊物，应该说在1986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是它又生长在体制内，能够坚持两年，完全靠了丁玲的威望。我到中国作协办调入手续的那一天，恰恰就是丁玲去世的日子，好像也就注定了我的命运。现在要定义的话，可以说《中国》是一本官办的同人刊物，这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特特例。仅仅两年（准确说1986年一年）就奠定了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它是《今天》之后，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有幸我是其中的一分子，参与了其中的过程。

《中国》对我个人的影响是一生的。《中国》的同事是我终生的朋友，牛汉老师是我永远的师长。他虽然没有手把手教过我什么，写诗也好，编辑也好，但他像一本字帖放在我案头，每天都要临帖写几篇。方方正正，规规矩矩。《中国》敢于标新立异，敢于拉出旗子来，1986年牛汉老师提出“新生代文学”，得到了丁玲的肯定。这本来就是一个风险极大的口号，必然要得罪一批老作家，甚至不同主张的中青年作家。首先它就把自己的编委们得罪了。在这之后，《中国》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尽管它能承受，不屈服，作抗争，但还是不可阻挡地走向了灭亡。

从《中国》，我也了解和感受到文艺界许多负面的影

响。现代文学史里提到的许多论争、论战，文学史告诉我们它是如何严肃，如何重大，有些关乎主义，有些关乎主张，其实有些根本就是意气、好恶而已，争斗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直有个敌我，而正常社会是没有敌我的，只有制度和文化。物理讲平衡，化学讲中和，数学讲对等，孔子说的社会，应该是和而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君子真的不多。大家都在制度下生活，你有你的理想，我有我的主张，有的是你的粉丝，有的是我的拥趸，这本来很好。《中国》也仅仅是众多刊物其中的一个刊物而已，也没必要给予更多关注，它的意义也应只限于作品。可是由于打压，和后来对它不公平的处理，就从中生出一种叫做精神的东西，这本不是《中国》的初衷。

除了编诗，《中国》有两件事跟我有直接关系，一个是终刊词的起草，一个是终刊号的印发。《中国》1986年12月号是终刊号，出现了两个版本。按说一个是正版，一个就是盗版。作协肯定说我们这个版本是盗版，我就是这个“盗版”的印发人。说是盗版，就因为在终刊号里有一篇终刊词，把《中国》停刊的原因和过程写出来告诉读者，这本来也是一个编辑部的责任。在临近付印前，作协派人把这篇终刊词撤换了，那个所谓的“正版”倒显得不伦不类了。目录前是“编者的话”，最后一期我们最后要说的话就是那篇终刊词。作协派人把终刊词拿掉了，在“编者的话”的地方，换上了一首长诗，莫名其妙。哪怕你作协也写个终刊词什么的，登在那个位置上，也不至于

搞出“编辑家”的笑话。这个情况，当时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黄起衰告诉了《中国》编辑部，黄起衰不是个是非之人，肯定不愿意陷入作协这场争斗之中，但他毕竟是丁玲的同乡，从情义上讲也不能隐瞒这个情况，再说跟他们签印刷协议的是《中国》编辑部，不是作协，他通报情况也没什么错。消息传到编辑部，大家群情激奋，马上决定要抢救这篇终刊词。决定派我和张铁钢去长沙，先交涉保留终刊号的本来面貌，如果不行就要想尽办法甚至不择手段把纸型弄出来，找地方重印。后来采取的就是后一种办法。铁钢是管印务的，所以派他去，还要去一个编辑，好跟社里打交道。我就自告奋勇了，那时真的是一腔热血，为主义牺牲也会在所不惜。那年因为发稿，我到长沙去了四次。执行这次特殊任务像是一次历险，我会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记述。

终刊词的发表是作协不能容忍的，我要是作协的头儿也不会容忍。但《中国》编辑部必须对读者有一个交待，那时我们感到了一种使命。10月11月的时候，感觉《中国》是保不住了，决定写一篇致读者的信，后来叫终刊词，把《中国》停刊的前因后果告诉读者。一个深秋的晚上，我、吴滨到鲍学超在禄米仓的家，他爱人小彭给我们做了晚饭。那时也不喝酒，吃撑了就是幸福。饭后把桌子收拾了，就开始写终刊词，我记录，他俩一句句说，我想到了也往上写，就这么一直写到夜里两三点。写到结尾的地方，觉得需要壮烈一下，像就义前的一呼，为这个结尾

又想了好久。我突然想到了阿垅的《白色花》。这首诗收在牛汉编的七月派诗人的集子里，诗集也叫《白色花》。那是一群被迫害的诗人，跟我们的处境有点相似，当然我们没有受到过迫害。所以就用了这首诗中的一个句子收尾：“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大家都感觉好，太好了。这个句子，在当时感动过多少人！从鲍家出来的时候，巷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路灯影影绰绰的。那时我抽烟，一夜抽了好多根烟，一出来感受到清凉的空气，浑身清爽。跨过大院门坎的时候，还捉到了一只刺猬。那年很奇怪，北京城里出现了好多刺猬，让我想到加缪写的《鼠疫》。但刺猬很可爱。当天上班，把终刊词交给中忱，牛汉、夏熊都看到了，觉得写得太激烈了，太意气了，还是客观点好，只陈述事实，自己不作评论，是非让人评说。于是让中忱去修改，后来发表的样子就是中忱改后的。中忱改后拿回来，我们三个都觉得太不过瘾，几乎把我们的棱角都磨平了。当然这可能就是最好的方式。

由我这本诗集又引出了“回顾《中国》丛书”。

牛汉不用电脑，请他写序就要送到他家去。我和李虹到他家，他正在看世界杯。老头精神矍铄，头脑清楚得很，但腿脚已经很不灵便。我请他写序，他说一定一定，但要给他点时间。他说好多年没动笔写东西了。过了一个月打电话要稿子，老头说哎呀，忘了忘了，还没写。又过了一个月打电话，还是这么说。在吉林大学文学院北京校

友会成立大会上，见到师兄刘福春。他编五卷本的《牛汉文集》，经常要去牛汉家。说起我的序，福春说你可把老头折磨坏了，他老惦记着这个事，但又动不了笔，体力不行了，集中不起注意。他给我出主意说让老头口述几句，我作个记录整理出来让他看看就得了。我说那就拜托师兄了。然后刘兄说，《中国》停刊已经24年了，差不多半个半个世纪，当时在《中国》上发表作品的人现在都是“著名”作家和诗人了，《中国》的办刊理念在当时创造或改变了文坛的风气，一直影响到今天，趁牛老头健在，重新编选结集出版，应该不是难事。下了会，我立即联系了林谦、吴滨、鲍学超、王中忱等，然后就有了我们在卢沟桥人天书店的聚会。除了我们几个，还有牛汉、冯夏熊、王增茹、刘福春。

关于这套丛书的总书名，我起的是“《中国》文学史料（或资料）”。听起来这名字好大。征求大家意见，中忱说，史料好像不应我们搞，可用回顾《中国》类似的提法。吴滨也附和，说我们还不老，自己都还在创作或作研究，叫史料太早了，再则我们编这个丛书的目的不是让它成为“史”，主要是看它对现在的影响，通过再次编辑，把这个价值重新挖掘出来，叫追寻《中国》或中忱说的回顾比较好。

于是这套丛书就定名“回顾《中国》丛书”。

《中国》人的一个梦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应邹进之约悄然破我两大戒

冯夏熊

我戒烟、戒酒、戒骄戒躁、戒不慎言、戒赌、戒毒、戒色、戒原本没有却总是夹不紧夹不住而总是要翘起来的尾巴。

我的戒，有我的理由。烟、酒、赌、毒之所以戒，是钱的原因，是缺钱、少钱、无钱之所致，而钱是身外之物，此戒是身外戒；我说戒色，不如说是色戒我，而这大概又是人之无钱无权的一般状态。权同样是身外物。至于说骄、躁、风流潇洒、浪漫恣意、豪气冲天言，更是权钱加身之际所鼓荡起的激情挥洒，和权钱的存在同样隽永，甚或被树为丰碑。无权无钱的骄、躁和不慎言，除导致心脏病、高血压、双腿麻木、两手颤抖、唇干舌燥、目瞪口呆外，别无其他。戒！不戒都得戒。

由此可见，上面的戒，对我而言，是不得不戒。是听顺自然之戒。不得不戒，自然之戒也。让我的意志归顺自然，让我的本性归顺自然，何乐而不为。至于扬起那原本没有的尾巴在空中摇来摆去，原本不是我的事，无所谓戒

它的翅膀硕大无形

一边是白昼一边是黑夜

不戒。我倒是习惯于挺起腰来，抬起头来，向空中举直双手，深深地呼吸，浅浅地呼唤。这大概是在承认了自己的归顺之后，向往着、企求着向自然的延伸罢。

由此可见，不得不戒，自然戒，非戒也。这些原本不是我的戒。但是我发现，我在自觉不自觉之中为自己设立了两大戒。第一戒是，戒听、戒闻、戒言中国的足球和中国足协；第二戒是，戒听、戒闻、戒言中国的文学和中国作协。这不是玩笑，也不是赌气。至于我为什么要戒去这样两处原本应该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最具魅力的场所，其理由完全属于我个人私人性质的，说或不说，说多或少，容我以后斟酌考虑。

大概是在小半年前吧，正是南非世界杯赛开始的日子，差不多有十二三年未曾谋面，甚至未曾通过音信的邹进，意外地出现在我面前。他是来邀我去参加一个聚会的。我们谈得那样随意和亲切，好像十多年的劳燕分飞，从来就未曾有过。他驾着车，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我们说起了朝鲜那位国脚还没伸脚就掉下眼泪来，而我们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的国嘴，对着那个特写，说个不停，那意思是说中国的足球是该回过头来向那位掉眼泪的国脚好好学习学习了……说着说着，我们来到了那座提起它的名字就会叫人伤感的卢沟桥的临近，闯进了那个邹进不辞辛劳精心修造起来的天地之间。

于是我和邹进肩并肩地见到了吴滨，还是那样白净漂亮。我始终弄不明白，在他那清澈透明的目光里，为什么